

追赶共和国脚步的时钟

阮直



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我父亲在内蒙古科右前旗人民银行工作也刚好满一年,手中有了一点积蓄,买了一块手表。农民的儿子有了一份工作,要学会按钟点上班,不能看日头多高该起床、该吃饭了吧。

父亲的这块表从此就成了左邻右舍的标准时钟,有些小孩子上学怕晚点,走上几十米远跑到我家问钟点。没想到这一来一回就差了5分钟,不过,那时候差10分钟也不算不准。

新中国成立5周年不久,我出生了,父母工作都很忙,便把我送到了科右前旗斯力很努图克的乡下姥姥家,随我到乡下的还有一

款烟台生产的“马蹄表”。母亲想,为刚满周岁的孩子喂米糊、喂水不能总约摸时间吧。可我的姥爷、姥姥连10个数字也不认识,有表没表并无区别。为了让姥爷、姥姥认识表,我妈晚回城两天。两天之后姥爷说他会看表了,几经母亲测试,其实还是不会,但总算认识了从1到10这些数字,看表没过关的主要障碍在于姥爷总是区别不开时钟与分钟的含义,虽能辨别出长短,但弄混长短表针几功能的概率永远在50%。

姥姥不耐烦了,抱怨妈妈:我们祖祖辈辈也没用表看时间,不也照样把你拉扯大,你赶紧回去上班吧,我们再用“日头影子”

对比着马蹄表,过些日子就知道是几点了。我妈说:新中国了,人们过日子要有新状态呀!

无论是城里爸妈的主动,还是乡下姥姥的被动,共和国都加快了人们的脚步,城市、乡村要过有时间概念的生活已经初显。

“大跃进”那年我3岁,摔了一跤诱发了潜在体内的骨结核,久治不愈,老爸只好卖掉了手表、自行车给我看病。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出生,本来殷实的家从此落败了。放在姥姥家的马蹄表也返城了,虽说发条老化,总是慢,可它毕竟还能看时间。

到了1965年秋,家里生活略有改变,我妈失业之后在家里养了一头猪,养了足足一年,卖了90元钱,算是发了点儿小财。我妈知道我爸爸喜欢手表,就去商场选,最便宜的天津“五一”牌手表也要95元,添上5元才买上一块表。从此家里又多了几许骄傲,因为隔三差五又有左邻右舍来问时间,手表虽是戴在老爸的脸上,可骄傲却洋溢在老妈的脸上。

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下乡了,老爸把腕子上的手表摘下套在了我手上,从此我也是戴表的人了。那一夜我失眠了,猫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看了4次时间,凌晨4点之后我才睡着了。

下乡之后,我这块手表看时间的的作用没发挥多少,生产队长给大家派工从来不按表上的时间,而是看春夏秋冬,看阴天晴天的日出日落。手表上的时间没有公共性。倒是哪家的小伙子去相亲,就找我借手表,有无结果不论,每次借表都能送我一包两毛钱的螺旋烟,手表成了我们集体户“创收”的一个物件了。

那时,无论城市、农村,结婚讲究“四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即使不能全有,只要有其中的两件,在农村就算是殷实之家。那个年代,有句顺口溜:“飞得快,永久耐,骑上凤凰谈

恋爱,戴上手表更是帅”。

改革开放之后,机械手表一下子成了落伍的象征,人们通过各种关系渠道,买到一块电子表戴在手上才有面子。单位的会议室、办公室、家家的墙壁上都挂着“康巴斯石英钟”,人们的时间观念从来没有那样强,好像所有人都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情结,这种时间观,推动着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学习。整个中国都处于亢奋状态,“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它不再是写在墙上的口号,而变成了中国的生存状态与集体人格,它时刻地提醒着人们,要抓紧时间。

手机普及之后,手表作为单纯的看钟点之物也就没了大用,可是进入2000年之后,人们的收入提升之快超出了自己的预期,多余出来的钱,就被奢侈品抢占了。

如今,稍有一点身份的人,手腕子上就会多出一块手表,这款手表可不简单,奢华的一块表就是一台小轿车,稍逊的也要几万元,一些名牌手表也贵过一部好手机。手表成为时尚新宠,我也欣然买了一块瑞士的梅花牌手表。

当互联网走进人们的生活,我们的时间观又被提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如果说此前还是个人为摆脱贫困诱惑着中国人加快脚步,可当下的步速,更多时候显得有些身不由己了。自行车速度慢,变成了电动车、摩托车,又变成了轿车、动车、高铁、飞机,飞机最好是直达的航线,好像多快都没时间快。电子邮件的速度也慢慢,最好是手机永远在手,处于开机状态,我在线,我也在线,我发过去,你就接收。这才是当下人对时间的要求。

这一切都是源于祖国发展的速度一日千里,谁若稍稍地打个盹儿,就跟不上时代的节拍了,追赶共和国脚步的“时钟”几乎变成“秒表”,我为祖国骄傲!

久远的拼音

周振华

越是久远,记忆越是清澈。比如早年的课堂上,那些和孩子们的手势一起跳动着的能发出多个音色的拼音字母还历历在目。

因为拼音,我被校长特批6岁可以入学。

小时候,我总喜欢和我年长一两岁的伙伴甚至更大些的孩子一起玩要。转眼这帮孩子已到了7周岁上学的年龄,唯独小他们一岁的我,不准和他们一起上学。这在当时,是我的一个心结。母亲为此硬着头皮带我来到西峰山小学杨校长的办公室,“杨校长,您就收下这孩子吧!他和他的这帮伙伴从刚会走路就整天在一起摸爬滚打,一起拾麦穗,一起捉迷藏……”杨校长说:“这是学校,孩子必须要年满7周岁方可入学,没什么商量!”杨校长说完觉得话有些硬,于是又微笑着对母亲说,“除非您孩子有特长。”母亲忙对校长说:“孩子会拼音,您看算不算特长?”“会拼音?”校长问,“好!让他说说!我听听。”

校长点上一支烟,母亲把我往前推了推,快!快给校长说说你姐姐教你的那些拼音。我笔直地站在校长面前,熟练地把b、p、m、f、d、t、n、l……一套拼音字母说了一半。没等我说完,杨校长就站起身来,好!

他又递给我纸和铅笔让我写,我接过纸笔在他办公桌的一角认真真、工工整整地写了起来。“嗯!不错!这就是特长啊!凭这,这孩子就可以入学!”校长同意了,母亲连声道谢。我也给校长深深鞠了一躬。

能提前上学,应该归功于姐姐。她把她的先学会的拼音字母一个一个教给我,也许天生对拼音敏感,我6岁时就可以认识很多字母了。姐姐是1958年上的小学。同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汉语拼音方案,此后这个方案便成为帮助小学生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这一年的秋季,国家开始在全国小学教学汉语拼音。学生入学,先学汉语拼音字母,然后用拼音字母帮助识字。姐姐上学正赶上学拼音,后来成了我的汉语拼音启蒙老师。教学相长,姐姐教我也充实了她的拼音基础。

由于家里劳力少,生活较困难,姐姐上到四年级就辍学了,小小的年纪就去生产队劳动了,锄地、挑水、打场、割麦子什么干。当时村里和姐姐年龄差不大的孩子,好像都没上过几年学,村子里很少有初中毕业的。他们的父辈更是没读过什么书,大多是文盲。后来大一点了才知道,当时全国都是这种情况,于是,上世纪60年代初,中央政府开展了扫盲工作。当年有句流行语,叫“扫盲学文化,不做睁眼瞎”,那年月扫盲运动几乎是路人皆知。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才10天,毛泽东主席就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文盲的艰巨任务。过了一年,毛主席又果断做出“文字必须改革,必须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于是政府开普及全民义务教育的百年大计出发考虑,最终选定了汉字拉丁化方案。就是说,汉语拼音和英文同出拉丁字母,一个用来拼写英文单词,一个为汉字注音。同时在推广普通话方面,采用汉语拼音字母作为学习工具。

汉语拼音的功劳到底有多大?谁也无法将其准确量化。可身处日新月异的时代的人们,分明感受到了它巨大的能量。

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没有拼音字母的,清末清初以来,外国人为传教和学汉语而设计的注音方式有拉丁字母式拼音、英国人的威妥玛式拼音、美国人肯尼迪设计的耶鲁拼音等。“这些方案都是为外国人服务的,既没有统一的语音标准,也不追求与汉语汉字读音

对应的准确性。”因此我们需要创制自己的、更加科学、更加准确的汉语拼音方案。

当时,中央针对全国文盲率达80%的现状,为能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特别重视扫盲和文化普及,开展了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三大任务。“一树开下两朵花,一朵摘掉文盲帽,一朵学会普通话。”这首歌唱出了百姓对汉语拼音的喜爱。

上世纪60年代初,我上小学时学习汉语拼音的场景历历在目。汉语拼音是一门大课、要课、主课。校内校外对拼音这门课程都非常关注,提得响,抓得实。除主讲老师每堂课反反复复强调拼音课的重要性外,学校墙壁上长期张贴着学好汉字拼音的标语或口号:学好拼音,受益终身;扫除文盲,拼音帮忙;拼音学得好,一家吃得饱;学拼音多识汉字,长知识报效祖国。在我的印象中,拼音课一点也不亚于学语文、算术课。可没想到,学了半天,下了那么大功夫,后来的日子拼音就悄无声息了,且一扔就是几十年。我怎么也没想到有一天突然又捡了起来,且越来越离不开这些拼音字母了。看来,所掌握的任何一门知识,即使一时派不上用场,也



都是封存起来的金子,它能够保值甚或升值,在某一天让你喜出望外。

汉语拼音是小学生打开知识大门的金钥匙。学会了拼音,孩子们便可以认读课本中的生字。随着识字量增多,阅读和写作的水平也会得到相应提高。因此,拼音是识字的基础,是阅读、写作的前提,也是学好中文不可缺少的。所以,我认为小学时不仅要努力学好扎实的汉语拼音,而且一定要掌握和应用好。

眼下,我的文学创作、编发微信、查询资料,都离不开汉语拼音。只要拼音学得好,功底扎实,就不会被这个时代甩得太远。面对需要及时处理的大量信息,只要学好拼音,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操纵键盘,不管年纪有多大,都可用自如。

小时候,我和伙伴们走在上学或放学回家的路上,嘴里总会不停叨念那些枯燥之味的拼音字母。好在先人编排得很顺口,“嗬嗬”起来有意思!加上小孩子的记性好,便更容易记住。几十年过去了,曾经刻苦学习拼音的场景仍历历在目,那些字母背诵起来还是那么朗朗上口,依旧亲切如故。

拼音真的帮了我很多忙,查字典、辨生字、发信息、打电脑、速记,都离不开拼音。在之后十几年的实践中,拼音的陪伴,使我能及时跟上时代的变化。仔细想来,拼音的发明真是太伟大了,它既是工具,又是老师,有时还像是朋友,生活工作中不能没有它。感谢它给我带来那么多的快捷与方便。我欣慰曾经的我没有怠慢“拼音”,所以现在尽管已是一把年纪了,还能够较好地学以致用。

就说写作,很多年我都固定在钢笔加稿纸的模式里,虽能留下一些纸质稿件,但创作起来效率低也难以做到得心应手。通过近十几年的实践,我现在几乎全部用拼音输入法打字了。

如果说《汉语拼音方案》前30年的主要功绩是为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扫除文盲,并且从国家标准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标准。那么后30年的主要功绩则在于适应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国际化。国家语委原副主任、研究员陈章太表示,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汉语拼音的这一功绩也将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常想,如果没有汉语拼音,国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不知是一种什么节奏和状况?新中国成立初期那80%的文盲率如何实现快速削减?10万余汉字怎么去实现快捷准确规范标准?汉语怎么与当今世界纷繁璀璨的文化元素相融与渗透?通过60多年的实践,这些早已不是问题了。汉语拼音仍继续发挥着它那特有的功能。

转眼,最早学习汉语拼音的那批孩子都已经老了,可他们仍乐此不疲地用拼音编辑着他们的工作与生活。

春满白象山

刘建春



早春茶最为珍贵。春节刚过,乍暖还寒,又逢一场淫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雨霁日出,一年一度采摘早春茶的时机悄然降临。经过一个冬天休养生息的茶树萌出新芽,鲜嫩极了,且只有短短20多天采摘时间,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

春节刚过,我们一行20多位作家走进茶场,与茶农们一起去采摘早春茶。

巴南二圣镇白象山茶园有一万两千多亩,放眼望去,茶山如海,郁郁葱葱,连绵起伏的碧波绿浪蜿蜒至天边,在阳光和雾岚中宛如一幅别有风情的田园画。“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如期而至,茶不期而遇……

白象山茶业的发端可以追溯到唐代。据当地老人称,当地有一座名叫白庙子的寺庙遗址,该庙建于唐代。寺庙建在白象山垭口处。寺庙有三千多石租谷的田产,和尚们就在白象山垭口处种植茶树,所制茶叶,除用于祭祀外,还供和尚和香客们饮用。

传说在两百多年前,清朝重臣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走访故交。途经重庆,巧闻二圣白象山出产圣茶,便登山求茗。啜了一杯,赞不绝口。站在山顶,登高望远,绿野丛中,茶农穿梭来往,顿觉心旷神怡,仰首叹道:“天下有如此圣茶,奇哉!妙哉!”……

度后,白象山茶叶经历了一个繁盛期,曾一度作为贡茶进献朝廷。但至清代光绪末年,社会动荡,朝廷停止了“贡茶”的征收,加之民国初年的瘟疫等频繁而严重的病灾,白象山的茶叶市场也逐渐变得萧条冷落。

解放后,白象山已荒芜,灌木丛生,藤蔓攀援,没有了昔日的热闹,成为一座无人问津的荒山野岭。直到1976年,一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这里开荒种茶,建立了茶厂。当时茶厂不到四十亩,一间破小的厂房,简陋的设备,年产值不到1000元,工人每天工资只有5毛钱。知青返城后,这片茶园就荒废了,眼看茶厂就要倒闭,当时还是茶厂工人的张节明,铁肩担道义,毅然承包了四十亩茶园和濒临倒闭的茶厂,辟路蓝缕,艰苦创业,通过企业成功转制,这艘曾摇摇欲坠的航船,乘改革开放的春风,驶向了阳光灿烂的彼岸……

白象山,满山如黛,苍翠无边。那一坳坳绿色的茶带顺山势铺展,赫然入目。

在茶香四溢的山上,我们身挎竹篓,行走在油绿茶园中,小心翼翼地采下那一个个孕育了二百多天的嫩芽头,轻轻放进篓子里。一排排茶带如错落有致的琴键,在暖暖的阳光照射下,与春风辐射出一曲曲温婉有韵味的采茶曲,习习徜徉在每一个采茶人身边,沁入心脾。置身于绿意盎然的茶园中,我们的双手突然也变得灵巧起来,在翠绿的嫩叶间上下翻飞。

采茶完毕,移至定心茶文化体验中心。体验中心位于茶园一侧,9栋中式风格的建筑,被四周树木环绕,风景优美。我们每人将自己竹篓的茶叶倒入一个很大的锅中,因数量不够,制茶师傅又加进一些茶叶,只见他手掌朝下,快速将茶叶沿着锅底弧度抓起,然后手掌再翻过来,让茶叶均匀散开落回锅里,手法翻得快、扬得高、撒得开、捞得尽……这一套加工工艺称之为干燥、理条做形、揉捻、杀青等,四道复杂手法交替炒制一气呵成。历经千分之十的精选细选,才使定心茶愈加弥足珍贵。

“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品上一杯自己采摘的新茶别有韵味。沸水倒进茶杯,茶叶在水中袅袅翻腾,一颗颗芽尖笔立,犹如绿剑群舞。茶汤色泽较淡,却黄绿透亮。那飘逸的淡雅香味,闻若绿云含烟。品一口,顿感滋味醇厚鲜爽,清心润肺。

巴渝文化有着千年的历史,曾孕育出革命军中的马前卒邹容、辛亥革命先驱杨沧白;孕育出国家级非遗文化遗产接龙吹打乐、木洞山歌等。“巴”是巴渝文化的根,巴渝是茶文化的发祥地。茶文化在巴渝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量,如今,已经深深融入了重庆人的血脉。

茶企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不忘带动乡亲脱贫致富,积极参与当地精准扶贫。他们从最初的四十多亩到现在的四千多亩,通过赠送茶苗、技术培训、订单收购、利益共享等惠农措施,扶持带动发展周边茶园两万亩,三千多户农民增收致富。这几年,通过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更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吃水不忘打井人”,每一颗嫩芽的采摘都离不开茶农们的辛勤付出。人们常说:“一斤碧螺春,四万春树芽。”那一斤定心茶,也要两万多颗芽头。一杯定心茶水,也要一百多颗芽头呀!难以想象,要想获得成百上千斤茶叶,需要重复多少次采茶的动作。

“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坐在茶室里,喝着定心茶,茶叶的清香氤氲在空气里,清香怡人,拂去了平时浮躁的心绪,自然淡静闲适,可谓定心。诚如老舍先生所言:“有一杯好茶,我便能万物静观皆自得”。

白象山的春天,犹如茶叶一般鲜嫩,处处弥漫着温馨的禅意。那茶香渐渐浓烈的,是乡镇村落的诗魂,是村民们幸福的情思。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